

《韩非子解读》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
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
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

国
学
经
典
解
读
系
列
教
材

宋洪兵 孙家洲 编著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韩非子解读

宋洪兵 孙家洲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解读/宋洪兵,孙家洲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1994-6

- I. ①韩…
II. ①宋…②孙…
III. ①法家-教材②韩非子-研究-教材
IV. ①B22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1944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韩非子解读

宋洪兵 孙家洲 编著
Hanfeizi Jied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4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8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这种看法显然是通达和正确的，值得今人加以借鉴。今天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经典学术教育，而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读经。

国学的精华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经部、子部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大略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说明国学与现代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因此，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教育可以相得益彰，和谐相生。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作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精神，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建构和谐社会，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得提升。所选书目，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来选定。书的编注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师为主，部分作者则为在国学院任教的人大其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邀请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学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些教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倾心编注了这套教材，表现出对国学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投入。

本丛书已列入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得到项目资金的支持。这对编好出好这套丛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重振国学、弘扬国学方面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支持力度。

这套教材的编写，如同人大国学院其他工作一样，均具有筚路蓝缕的探索性质，尽管我们已在主观上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使这套丛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共同推进国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2008年6月

目 录

导读	1
----------	---

—

存韩	39
难言	51
孤愤	61
说难	71
和氏	82
问田	89

二

主道	97
备内	105
奸劫弑臣	114
南面	131
解老	139
六反	175
五蠹	189
显学	214

三

有度	233
二柄	245
亡征	252
三守	262
饰邪	268
难势	285
定法	296
内储说上 七术	304
内储说下 六微	340
参考书目	371
后记	372

导 读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不仅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是先秦时期最后的大思想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韩非子也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观点既受前期法家诸如管子、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影响，又与儒家、道家、墨家、名家乃至纵横家的思想密切相关。尽管后世对于韩非子的思想褒少贬多，大都持批判态度，然而其能够相对完整地流传至今，却又表明其作为古典政治智慧的存在价值及正面意义不容忽视。

《孟子·万章下》曾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因此，研读《韩非子》，了解韩非子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时代，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当我们去探寻韩非子的身世时，有关这个著名思想家的记载却又寥若晨星，雪泥鸿爪。对于韩非子的生年，学界基本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以钱穆为代表，根据韩非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卿的历史记载，假定韩、李年龄都在 30 岁左右，及至韩非子在韩王安五年（公元前 233 年）使秦并被迫自杀，李斯已在秦 15 年，据此推断韩非子生于韩釐王十五年（公元前 280 年）前后。^①另一种意见以陈千钧为代表，根据《韩非

^① 参见钱穆：《李斯韩非考》，见《先秦诸子系年》，511～513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子·问田》中堂谿公曾与韩非子对话的记载，然后再参照《外储说右上》堂谿公与韩昭侯（公元前 358—前 330 年在位）同时的文献，假定青年堂谿公在公元前 330 年左右见到晚年韩昭侯时大致年龄在二三十岁，如果他活到 90 岁，那么在公元前 270 年左右，这样就完全存在和时年大约 25 岁左右的韩非子探讨人生问题的可能性，据此推断韩非子生年应在公元前 295 年，死时大约六十余岁。^① 第三种意见以陈奇猷为代表，他认为李斯入秦时韩非子在学术上已经小有成就，年纪应在 50 岁左右，根据李斯在秦国从政 15 年推断，死于公元前 233 年，韩非子寿命应为 65 岁左右，由公元前 233 年倒推 65 年，所以韩非子生年应在公元前 298 年左右，生在韩襄王末年。^② 三种意见其实都以“假设”为推论前提，故而得出的结论也只具参考价值，在确凿充分的史料出现之前，韩非子出生的具体年代唯有存疑待考。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战国策·秦策五》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知道，韩非子出身韩国王室，具体为哪个韩王之后裔，书缺有间，无法考定。不过，韩非子属于韩王庶出、地位不高这点却是可以认定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所谓“诸公子”，即是指太子以外的王子，同时诸公子中又分王后之子与嫔妃之子，嫔妃之子中又存在得宠嫔妃与失宠嫔妃之别。从《韩非子》满篇浸透的孤独、愤懑情绪推测，韩非子不太可能是王后正室所生。故而在嫡庶尊卑等级秩序森严的时代，韩非子政治地位不高倒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韩国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令韩非子寝食难安，坐卧不宁。韩国本是“晋之别国”，三家分晋后，韩景子在公元前 403 年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此后，韩国曾一度强大，于韩哀侯二年（前 375 年）灭掉郑国，迁都新郑。公元前 355 年，韩哀侯任用申不害为韩国宰相，“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从韩立国到申不害卒亡的这段时间，虽然韩曾屡受秦、魏欺凌，但其国力尚强，除兼并郑国外，也曾打败过宋国。但总体而言，列国纷争的时代，地处秦、魏、楚等数个大国之间的韩国，国势最弱，处境最难。东方五国攻秦，韩国必须权衡利弊选择站在哪一方；秦国东进，韩国也是首当其冲。无论如何，韩国

① 参见陈千钧：《韩非新传》，载《学术世界》，第一卷第二期，1935。

② 参见陈奇猷：《韩非生卒年考》，见《韩非子新校注》附录，1211~1213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要么得罪强秦，要么得罪东方五国，因而总是外患不断，战乱不已。及至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的处境正如韩非子在《存韩》篇所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与郡县无异也”，苟延残喘，已经毫无尊严可言。外交领域的软弱无力，折射出了韩国内政治理的腐败和混乱。由此，韩非子猛烈批判那些手握重权的“当涂之人”及“重人”，数次上书韩王，希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均未得到正面回应，加之在生理方面存在口吃缺陷，所以在政治上并未受到韩王重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甲冑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

究主要涉及韩非子之死是否与李斯相关的问题。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明显倾向于承认韩非子之死与李斯有关：一是李斯在秦王政面前诋毁韩非子“终为韩不为秦”而使其下狱，二是“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联系此前“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的暗示，韩非子之死并不排除李斯忌妒同门而欲杀之的可能性。同属战国时期而时代较早的一个典故——孙臆与庞涓师出同门却遭庞涓陷害，更为人们品评李斯与韩非子之死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历史依据。所以王充进一步将司马迁潜含的观点明确化为：“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论衡·祸虚篇》）对于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近人钱穆表示怀疑：“疑《史》所称李斯潜杀非者……然此自政论之不合，斯之为秦谋者如此，未见其即为潜。”并分析之所以形成李斯妒杀同门的印象，原因就在于：“李斯晚节不终为世诟病众恶所归。所谓潜杀非者，今亦未见其必信耳。”^①此说在当代虽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但存在着较大观点分歧。^②我们认为，欲正确认识和评价韩非子之死与李斯的关系，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臣子的李斯是否敢于背着精明的秦王私自逼迫韩非子自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此处隐含的信息值得反复品味。秦王派兵攻韩扬言要见韩非子的“知音难求”的迫切心情与韩非子到秦国之后秦王对韩非子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正面的态度仅仅为“悦之”而已，显然，“悦之”只是一种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情感形式，其余诸如“未信用”，对李斯、姚贾要求杀害韩非子以绝后患的进谏“以为然”并命令将

① 钱穆：《李斯韩非考》，见《先秦诸子系年》，513页。

② 当代学界关于韩非子之死与李斯有无关系的争论，参见奚椿年：《韩非非李斯“忌才”而死辨》，载《江海学刊》，1993（4）；王举忠：《韩非杀李斯考辨》，载《辽宁大学学报》，1981（1）；李福泉：《韩非入秦辨》，载《求索》，1981（4）；邓廷爵：《关于〈韩子·初见秦〉的作者与韩非之死》，载《学术月刊》，1982（3）；龚维英：《试析韩非之死》，载《中国史研究》，1983（2）；王举忠：《李斯杀韩非原因再考辨》，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4）；徐勇：《李斯杀韩非原因辨析：兼与王举忠同志商榷》，载《松辽学刊》，1986（1）。

韩非子关进监狱等行为均表明，秦王对韩非子表面上似乎十分尊崇，暗地里却真心想将其置于死地。根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实为一个非常善于察言观色的政治人物，“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秦始皇一次在梁山宫，从山上看见李斯车骑甚众很不高兴，秦始皇的左右随从很快将这个消息传到李斯那里，李斯赶紧减少车骑数量，惹得秦始皇一怒之下，将当时在场的左右随从以泄密罪名全部杀掉。从这件事情也能看出，李斯不仅善于察言观色，而且还有多种渠道来探知秦始皇内心的真实想法。因此，李斯之所以敢将毒药送给韩非子并逼迫其自杀，可能是得到了秦始皇的默许的。否则，李斯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逼迫韩非子自杀，事后秦始皇虽然后悔将韩非子下狱，得知其死亡消息后却不再追查背后的原因，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就此而言，韩非子之死，其实与秦始皇的关系最大。

那么，韩非子之死且不真的与李斯毫无关系，真的像史学界某些观点

隐约表达了韩非死有余辜的观点。^①宋代学者苏辙也认为韩非子的死与其《说难》篇体现的非道义人格有关。沿此思路，后世学者进一步将《说难》与卖国求荣、咎由自取联系起来，对韩非子的道德品质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司马光《资治通鉴·秦始皇十四年》云：“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江琬《读子卮言·论黄老老庄申韩之递变》也认为韩非子“残民而弃国”^②。

由于对韩非子残民弃国、不得善终的批判观点，直接牵涉到人们对韩非子整体人格的评判，所以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韩非子作为一个出卖宗主国的卖国者，客死他乡的结局并不值得人们同情。如郭沫若说：“有些学者爱说韩非忠于韩，实有心为‘存韩’之谋，其实那是上了李斯的当。韩非毫无疑问是有心用秦的。”^③有学者对此表示赞同：“《存韩》篇乃韩非入秦后上秦王政书，题为后人所加。有些学者因此便认为韩非忠于故国，那简直是把韩非和楚的爱国诗人屈原等量齐观，其谬可知。”^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韩非子的经历、人格都体现了一种忠于韩国的爱国精神。韩非子在秦朝被奉为“圣人”的历史自不必论^⑤，即便在汉代，陈人武臣也认为“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孔丛子·答问篇》）。^⑥近人陈千钧认为：“韩非乃爱国者”、“韩非救世之志，与古之圣贤有何异哉？”、“韩非具有勇敢牺牲之精神”^⑦，陈黻宸也说：“故始以亡韩者为秦谋，继以为秦谋者存韩，终必将以为韩者亡秦。”^⑧现代新儒家代表人

① 《法言·问明》记载：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说之不合非忧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② 陈启天：《韩非子参考书辑要》，99～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45；又，陈奇猷：《韩非子考证资料辑要》，见《韩非子新校注》附录，1214～1271页。

③ 郭沫若：《韩非子的批判》，见《十批判书》，40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④ 龚维英：《试析韩非之死》，载《中国史研究》，1983（2）。

⑤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李斯在阐述政治见解时不仅征引韩非子的政治观点作为依据，而且还以非常崇敬的口吻称呼韩非子为“韩子”、“圣人”。

⑥ 转引自陈启天：《韩非子参考书辑要》，138页。

⑦ 陈千钧：《韩非新传》，载《学术世界》，第一卷第二期，1935。

⑧ 陈黻宸：《诸子哲学》，见《陈黻宸集》，296页。

物之一的熊十力也对韩非子的爱国情怀深为赞赏，认为：“其爱国情思深厚，其风节孤峻，使韩子生今日，余为之执鞭，所歆慕焉。”^① 第三种观点试图在“卖国论”与“爱国论”两种观点之间进行调和弥缝，认为韩非子存在既想“存韩”又欲“用秦”的矛盾心态。如钱穆认为韩非子只能算半个“抱有狭隘国家观点”的人，因为“他是韩国贵族。他在先也有很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到秦国以后，意志就不坚定了，所以只能说他是半个”^②。

我们认为，分析上述不同评判意见，应该注意到韩非子入秦前后的历史背景：韩非子早年曾数次上书韩王，然而“韩王不能用”；后又云：“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这至少表明，韩非子出使秦国，乃受韩王派遣，绝非韩非子自己心存“用秦”之心。试想，如果他真有“用秦”之意，为什么非要等到韩国眼看就要灭亡了以一个亡国之臣的身份去谋求闻达呢？如果他要对韩国早已死心，从《孤愤》、《亡征》篇体现出的韩国政治形势，足以让他早就死心而去追随秦国了。事实上，他并没有如此做。虽然他对韩国的腐朽政治充满了愤懑，可对其宗主国变法就能图强的信念始终不曾消失。

王先谦评价韩非子说：“韩非处弱韩危急之时，以宗属疏远不得进用，目击游说纵横之徒，颠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贼民恣为暴乱，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国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权力，斩割禁断，肃朝野而谋治安。其身与国为体，又烛弊深切，无由见之行事，为书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核，不与战国文学诸子等。……《初见秦》诸篇则后来附入者，非劝秦不举韩，为宗社图存，画至无俚，君子于此尤悲其志焉。”^③ 王先谦在此虽然主张《初见秦》不是韩非子亲手所作，从而突出强调韩非子为“宗社图存”的深沉悲情，但是正如陈祖釐所指出的，《存韩》与《初见秦》在篇章内涵上都存在“先赵后韩”的倾向，认为这正是韩非子苦心孤诣想出一招妙计，“其亡韩所以存韩也”^④。

① 熊十力：《韩非子评论》，25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学界对韩非子的“爱国”思想的探讨非常深入，相关内容可参见陈启天：《韩非子参考书辑要》，39页；肖月贤：《试论韩非的爱国思想》，载《郑州大学学报》，1984（3）；姚燕民：《韩非子通论》，44～45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吴秀英：《韩非子研议》，31～33页，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卢瑞钟：《韩非子政治思想新探》，“韩非爱国情操不容置疑，其恶名系遭人陷害”一节，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9。

②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见《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③ 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序》，此乃王先谦为其从弟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所撰写的序言，见《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

④ 陈祖釐：《韩非子别传》，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33。

所以，即使《初见秦》为韩非子在秦所作，也丝毫不影响其为“宗社图存”的政治志向。之所以肯定韩非子为“宗社图存”而费尽心机的努力，并非赞同韩非子存在近代意义上“爱国”观念，而是与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宗法观念有关。^①《吕氏春秋·知士》篇记载靖郭君不听昭阳以数倍之地换取薛地的理由是：“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乎？”表明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的宗庙社稷观念，在战国时期尤其在战国贵族的观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初见秦》“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的形势分析，可谓恰当地道出了这一点。因此，作为韩国“诸公子”的韩非子本人来说，其贵族地位无疑会强化“宗社图存”的宗庙社稷观念，并且，宗庙社稷观念与“天下”观念之间在周代制度实践中存在着互补相容的关联，肯定韩非子的宗庙社稷观念，并不意味着韩非子没有“天下”观念。无论人们对韩非子的思想内涵及特质作如何评价，但在其人格评论方面，确实应该具有王先谦的见识和眼光。

二

从有关韩非子研究的时间和规模来看，最早对韩非子的思想进行研究的时间可以追溯至秦朝。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和李斯都曾征引《韩非子》以证成己说，其对韩非子思想的熟悉程度可见一斑。自两汉，迄今，几乎历代都有文人学者或多或少、或散论或专门地对韩非政治思想有过研究和评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内容涉及韩非个人方面（人格、身世、思想等）和《韩非子》方面（版本、点校、注释、考证等），已然形成一门“韩非学”^②。

《韩非子》在汉代始编撰成书，并非韩非子亲手编订。^③ 初名《韩子》，

① 有关战国时期宗法观念的详细阐释，参见晁福林：《试论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发展和衍变》，载《史学史研究》，1999（1）。

②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89年，专门以韩非及《韩非子》为主题的专著、论文且不包括以法家、先秦诸子为主题对韩非子的探讨，主要以中日韩的研究为主，共计1115项之多。参见郑良树：《韩非子知见书目》，1~181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

③ 周勋初认为西汉刘向在校中秘书时首先将《韩非子》编撰成书。参见周勋初：《〈韩子〉的编者——刘向》，见《〈韩非子〉札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认为：“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歿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秦而在韩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纪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以其书本出于非，故仍题非名以著于录焉。”参见陈启天：《韩非子参考书辑要》，125页。但是，张觉另有推测，他认为，“《韩非子》是秦灭韩后至李斯被杀之前（即公元前230年至前208年）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订的”，参见张觉：《韩非子校注·前言》，长沙，岳麓书院，2006。